

德国汉学家卫礼贤： “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

□ 吕 杰

理查德·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年），德国著名汉学家，在其57年的一生中有25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对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和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对《易经》的翻译与讲授，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著名翻译家杨武能《卫礼贤——“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一文，称赞他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播”的功臣。著名学者季羡林评价卫礼贤是“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

自称是山东人，并 取汉文名字

1873年5月，卫礼贤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早年接受了严格的宗教教育。1897年德国强占中国胶州湾后，德国魏玛传教会（同善会）招募去青岛的传教士，卫礼贤看到这一消息后决定前往中国。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卫礼贤的人生轨迹，也为他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奠定了基础。1899年，卫礼贤抵达青岛，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被中国丰富的文化和哲学所吸引。他开始学习汉语，并深入研究中国的经典文献。在这个过程中，卫礼贤逐渐意识到，他真正的使命不在于传教，而在于理解和传播中国文化的精髓。

在青岛的日子里，卫礼贤不仅与当地的中国学者和官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还积极参与到社区的建设和教育工作中。他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对于世界，尤其是对于西方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和价值。这种认识促使他放弃了原有的传教士身份，转而致力于成为一名汉学家和教育家，他自称是山东人，信儒教，并自取汉文名字——卫希圣，字礼贤，亦作尉礼贤、魏礼贤。

翻译《易经》等经典，研究介绍中国哲学和文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中国认识程度的加深，卫礼贤开始关注并研究中国哲学和文化方面的经典，其中他对《易经》的翻译堪称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典范事例。

《易经》作为中国古典文献中最为深奥和富有哲学内涵的一部作品，对于任何译者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卫礼贤深知这一点，他在翻译《易经》时，不仅要传达文本的字面意义，更要捕捉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和



卫礼贤德译本《易经》初版扉页

文化精神。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让西方读者能够理解和欣赏这部东方智慧的精髓。

卫礼贤在翻译《易经》时采用了一种创新的方法。他首先直接从中文原文翻译成德文，然后与同他亦师亦友的劳乃宣一起，将德文译文翻译成中文，以确保其忠实于原文。这个过程往往需要多次反复，直到达到满意的准确度和深度。卫礼贤的这种方法体现了他对翻译工作的严谨态度和对原作深深的尊重。卫礼贤的《易经》德译本在德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被认为是《易经》在西方的经典版本。

与卫礼贤同时代的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曾这样说，“卫礼贤最大的成就就是《易经》的翻译和评注”“是卫礼贤成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的易经，使易经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卫礼贤的译介文字，荣格获得了对他心理学研究影响至深的中国思想宝藏。卫礼贤的《易经》翻译工作不仅是一次语言的转换，更是一次文化的对话，展示了如何通过语言和文本的桥梁，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

此外，卫礼贤还撰写了多部关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著作，如《中国心灵》《中国人的生活智慧》等。这些作品不仅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社会在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内在形象，还探讨了中国人的精神特质以及中西文化之间相互比较和融合的可能。

在《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一书中，卫礼贤着重介绍了中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特点、文化发展的特质，以及东方思想对西方复兴的意义。关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卫礼贤认为，东西方的精神结构不是相互排斥意义上的对抗，而是相互补充意义上的对称。他强调不能简单地孰优孰劣，“实际上，在人类的东方和西方都产生了积极向上的文化”，双方

正错误的历史主动精神。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容易刹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着力解决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问题，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保证了党长盛不衰并不断发展壮大。

“能”在我们党有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建党百余年来，我们党在积极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同时，及时将加强党的建设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上升为制度，不断提升用制度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与时俱进制定和修订党内法规制度，形成了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党的组织法规、领导法规、自身建设法规、监督保障法规为框架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让制度“长牙”“带电”。同

都应当从对方那里汲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因此，当西方思想过于注重机械因果性而陷入危机时，东方思想中对有机生命观的阐释就成为了一种可以被借鉴的资源。同样，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人的核心价值观的关切，也使得当时的中国可以通过汲取西方有益的力量而走向复兴。

《中国心灵》和《中国人的生活智慧》是卫礼贤对中国文化和中西方哲学思想进行比较探究的潜心力作，这两部作品展示了他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深刻理解与热爱。正如历史学者孙立新所说，“正是基于对西方文化的深刻反省和对中国文化的真诚喜爱，卫礼贤提出了综合东西方文化的思想主张”。通过这些著作，卫礼贤成功地将中国的智慧和精神传达给西方世界，成为中西文化对话的宝贵桥梁。

开展教育实践和学术活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除了翻译中国古代典籍、撰写汉学著作，卫礼贤还积极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和学术文化交流，宣传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1900年，卫礼贤在青岛创办了礼贤书院，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成为青岛九中。礼贤书院的创立初衷是为德国人子女提供教育，但很快学校便对华人开放，吸引了众多渴望学习现代知识的中国学生。卫礼贤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提倡平等教育；同时，他认为，教育应该超越种族和文化的界限，为所有求知者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极为先进的观念。卫礼贤将德国的教育模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教育体系。他强调中文和德文的双语教学，同时引入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课程，学校不仅

时，推动完善党内监督体系，健全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工作格局，推动党内监督与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协调，构建起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更加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为推进自我革命提供了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保障。

“能”在我们党有新时代伟大自我革命的成功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境界、“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强烈使命担当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气概，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党的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给出的“第二个答案”。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

教授传统的中国经典，如四书五经，还包括德语、数学、地理、自然科学等西方学科。这种教育模式旨在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理解能力，同时也增加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尊重。

卫礼贤在青岛期间，参与创立了尊孔文社，这是一个旨在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团体，成为一个文化交流的载体和平台，通过举办讲座、讨论会、出版译著和开展文化活动等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卫礼贤和当时许多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入交往，包括周馥、劳乃宣、辜鸿铭等。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周馥出任山东巡抚后前往青岛视察。周馥对卫礼贤的办学活动十分赞许，二人因此结下友谊。周馥后来特别向卫礼贤推荐劳乃宣去主持尊孔文社的日常事务，而劳乃宣则成为了卫礼贤翻译《易经》《道德经》等典籍的合作者和领路人。其间，劳乃宣耐心地向卫礼贤解释这些中国经典的内涵和外延，使其较为顺利地将其翻译成德文。卫礼贤在《青岛的故人》一书中写道：“他用中文翻译内容，我做下笔记，然后译为德文，他再行行对比，检查我的翻译是否在所有细节上都准确无误。”这种教导和相互交流，让卫礼贤逐渐体悟到中国文化的精深之处，也使他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及后来的教育事业更加符合中国实际。

在与辜鸿铭的交往中，卫礼贤特别注重围绕中西文化的异同之处进行探讨，双方在学术上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目标，即如何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吸收和融合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思想。他们通过书信往来，讨论翻译工作中的问题，交流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理解。卫礼贤曾将自己翻译的《论语》《道德经》等寄给辜鸿铭请其斧正，辜鸿铭客气地称其《论语》翻译是“了不起的翻译”，同时也直率地指出他没有解释清楚翻译《道德经》的缘由。辜鸿铭在信中提到，翻译中国经典时应更加注重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的传达，而不仅仅是文字的直译。

卫礼贤的日常生活和汉学研究，体现了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刻理解和热情。他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不仅丰富了西方的汉学研究，也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开辟了新的道路。他的人格魅力和学术成就，使他成为了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一座桥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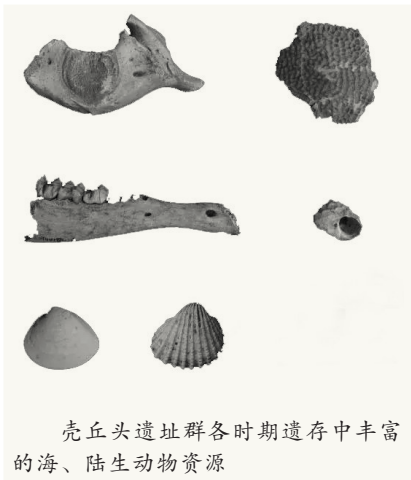
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出进一步阐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并概括出“六个坚持”的基本路径、“九个坚持”的主要经验。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结合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实践经验提出了“九个以”的实践要求。这些宝贵的成功经验，直接来源于新时代自我革命的生动实践，蕴含着深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化了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对我们党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推进自我革命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价值和深远的实践指导意义。

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我们要怀着深厚感情、坚定信仰，强烈使命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永葆初心、鼓足信心、坚定决心，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决落实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九个以”的实践要求，把党的自我革命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严密，把每条战线、每个环节的自我革命抓具体、抓深入，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监委主任）

4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西米纳举行会谈时指出：“我在福建工作期间就了解到，广泛分布于太平洋岛国的南岛语族，就是起源于福建。特别是福建平潭这个地方，当地的壳丘头文化遗址有很多考古发现，是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习近平主席所讲的壳丘头文化遗址，指的就是当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

壳丘头遗址群位于福建省平潭岛北部沿海山麓背风坡地上，包含壳丘头遗址、西营遗址、东花丘遗址和龟山遗址等遗址点，总面积超16万平方米。壳丘头遗址群是福建沿海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主要文化层的堆积物80%以上为贝壳，居民采集食用的贝类有19种之多，其中绝大部分为丽文蛤，也是台湾海峡西岸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该遗址群对研究实证中华海洋文明的起源与传播有着重要意义。



壳丘头遗址群各时期遗存中丰富的海、陆动物资源

南岛语是世界上唯一主要分布在岛屿上的一个语系，“南岛语族”是唯一主要分布在太平洋岛屿上的族群，人口约3亿，以福建为中心的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则是“南岛语族”向大洋迁徙的重要起源地。在考古学研究领域中，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既是我国史前海洋文明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也是与太平洋地区早期文明扩散、交流、互动的直接证据；既承载着中华文明由内陆向海洋扩散的重要历史，也为加强文明互鉴、美美与共，搭建中国与太平洋地区的文化桥梁提供了支撑基础。

距今约6000—4500年的台湾大坌坑文化被认为是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代表性遗存，而以壳丘头遗址群为主体的平潭壳丘头文化与台湾大坌坑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具有相近的文化内涵，壳丘头遗址群的考古发现建立了东南沿海岛屿地区距今7500—3000年考古学文化序列。其中，西营遗址距今约7300—6500年，代表了目前平潭岛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陶器以夹砂灰陶、黑陶、红陶等为主，器形包括圈底釜、钵等，表面装饰多样。壳丘头遗址距今约6500—5000年，陶器以夹砂陶为主，表面装饰以压印贝齿纹、戳点纹、刻划平行条纹等为主。东花丘遗址距今约4000—3500年、龟山遗址距今约4000—3200年，主要代表着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存。从考古学文化的早晚关系和发展演变规律来看，早期史前文化有从内陆向沿海逐步发展的趋势，台湾海峡两岸史前文化交流关系密切，因此福建沿海地区被认为是南岛语族早期人群形成和向台湾扩散的重要出发地。

而地质研究表明，台湾海峡在人类存在的更新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陆地，所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也印证了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多次往返大陆与台湾岛之间。在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期，福建沿海发生过数次海进海退事件，台湾海峡也数次成为陆地或陆桥，距今约8000年左右海平面低于现今约16米，很可能存在“东山陆桥”通向台湾岛。我们目前新发现福建沿海的史前遗存以及马祖“亮岛人”都生存于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壳丘头遗址群的考古发现，不仅证实台湾的南岛语族早期人群发源于大陆福建沿海地区，而且揭示出海峡两岸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文化关联和共同的文化起源，也间接证明福建沿海地区是太平洋岛国南岛语族的起源地。

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前海洋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壳丘头遗址群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依托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考古学研究，不仅可以探索中华文明的海洋性起源和早期发展，旨在以海洋视角揭示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宏大进程，还能揭示其对周边地区尤其是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深远影响。

南岛语族早期人群从陆地到海洋，逐渐形成具有海洋性的族群特征，壳丘头遗址群的考古发现是这些特征的实物证据。这种海洋特性生根于整个东南沿

见证中华海洋文明的起源与传播 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

□ 周振宇

海区域的史前文化中，反映在空间利用方式、居址特征、动植物资源利用种类和方式等方面。

在居址位置方面，先民选址集中于滨海三角洲处的低缓山丘或岗地，背山面水。在空间布局上，聚落规模不大，划分为小而分散的居住区，建筑主要为杆栏式。通过对壳丘头遗址群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进行分析，可以推断出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生活方式和主要经济活动。在动植物资源利用种类与方式方面，他们以采集野生植物果实、采捞贝类和鱼类为主，同时狩猎小型动物、掌握原始的农业技术，并能根据环境进行有限的饲养与种植。遗址贝壳堆积中发现的贝类种类丰富，其中牡蛎数量最多，其次为泥蚶、文蛤、青蛤等。动物包括龟类、鸟类、水牛、鹿、海豚以及各种鱼类，均属于野生动物，反映出鲜明的渔猎经济形态。遗存中还发现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的植硅体水稻遗存，这也是中国东南沿海岛屿最早的水稻遗存。此外，还有稻谷、黍、粟、豆类等农作物淀粉粒遗存，这些都揭示出不同时期海岛史前人群的农业行为。

由此可见，海洋资源的广泛利用和成熟的农业技术，显示出南岛语族早期人群多样化的生计模式，体现出兼具大陆性和海洋性的显著特征。壳丘头遗址群的重要发现，让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史前海洋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中华文明海洋性起源的重要实证，也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演进过程。

除此之外，从南岛语族分布领域的境外考古发现中，也能找到南岛语族或者是壳丘头文化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向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扩散的佐证。在南岛语族分布的南太平洋地域内，普遍分布着很多相似的物质文化现象，如段石铈、肩石器、树皮布等标志性器物。这些器物由东亚大陆向南太平洋诸岛传播，显示了中华远古文化的重要影响力。通过系统深入研究这些器物，管窥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不同区域之间相互交流的方向与线路，对理解新石器时代人类跨越太平洋的实践活动，廓清海上丝绸之路史前史也有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沿海地区及南海海域海洋考古工作的开展，我们将勾勒出史前和历史时期我国先民利用海洋资源探索海洋之路的历史画卷，对认识和理解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演进及其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